

李植《杜诗泽风堂批解》对杜诗学的贡献

[韩国] 闵庚三

李植，号泽堂，晚更自号泽癯居士，字汝固，朝鲜德水人。朝鲜宣祖 17 年（1584），生于京城，卒于仁祖 25 年（1647）。作为一个学识渊博的文学批评家，李植认为学诗首先必须以杜诗为准的，所以，他花了很多时间和功夫，撰成了这部集注性的《杜诗批解》。在《杜诗批解》的结构和内容上，虽然仍有道学家的陋习和偏见，但是在很多的地方可以发现创新的思想体系和独特的体例。可以说《杜诗批解》，是李植在充分吸取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，采纳众长，删去冗繁，间有发前人所未发的一部杜诗学著作。他对杜诗所做的工作，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。

一、校 释

杜诗由唐传至明清，从中国流到朝鲜，经过辗转传抄翻刻，异文颇多，对字词进行校释，是杜诗注家的首要功夫，虽然朝鲜的学者，对于训诂的认识水平不如清儒那么高，但是李植每每留意于此，提出不少对字句的校释。如批《鹿头山》“斯人亦何行”云：“人，当作民，避太宗讳也。”愚按“人民”一词，先秦典籍中已很常见。但如仅用一字，则通常用“民”而不用“人”，然而唐太宗名李世民，在唐代诗歌中，常见以“人”代“民”的例子，如刘禹锡《平蔡州》诗三首之一云“四人归业，闾里闲”，此所谓四人就是四民，指士农工商而言。李植把这些常见的问题明确地提出

来，可知他对杜诗的态度非常严密。又如《杜鹃行》“业工窞伏深树里”云：“业工，当作业业，点句之误也，东岳考有注。”愚按对于怎么解释“业工”的问题，朝鲜学者们议论纷纷，难归于一，如车天辂《五山说林草藁》云：“余昔少时，曾见一书，杜鹃雏曰‘业工’，今不记出自何书。”又，李瀾《星湖僊说·诗文门》云：“杜甫《杜鹃行》云‘业工窞伏深树里’，今考《事文类聚》，以业工作作业业，盖一字叠书者，只加两点如工字样，此所以传讹也。”李植二十八岁时，“时族父东岳公讷为潭阳府使，从而问诗法。又与权石洲翬、洪鹤谷瑞凤、任疎庵叔英、车五山天辂酬唱评论。石洲诸公亟加推奖。……”^①，因此李植批解杜诗时，也吸收同时代学者们的成果，“业工”的注释即是一例。以“业工”作“业业”的解释有相当可靠的根据，即《事文类聚》云“业业窞伏深树里，四月五月偏号呼”可足为证。又批《韦讽录事宅观曹将军画马图引》“盘赐将军拜舞归，轻纨细绮相追飞”云：“盘，疑颁字，轻纨细绮加赐物也。”李植运用声相近意亦相似之法，将“盘”读为“颁”，使杜诗难解之句意豁然贯通，可知他观察事物的精微。又批《诸将五首》其一“见愁汗马西戎逼，曾闪朱旗北斗闲”云：“闲，作殷为宜，如《后汉书》：‘朱旗绛天’，言能使北斗色殷也。闲字没意义，过慢之闲字，亦非。一本作过闲幔正，与下意湍作对，意境亦的。闲字，乃诗家恒用，不应全无，只见二字。旧说称避讳者良是。”闲字，《杜诗详注》作殷字，仇兆鳌对此注云：“朱注指为旗上斗星，则殷字正与闪字相应。周必大曰：《汉书》有朱旗绛天，此云朱旗北斗殷，见斗亦赤矣。赤，红色也，修书时避唐宣宗讳，故改作闲耳。”李植注杜诗，引用的典据，如此广泛而细密，由此可知其学识之博大精深。清代仇兆鳌的看法完全与李植的见解不谋而合。又批《冬深》“花叶随天意，江溪共石根。早霞随类影”云：“回气凋落，花叶已尽，江与溪只见石根也。霞光得寒气而淡泊者，如光影之薄，言难提之也。○随字，不应对叠，恐须字之转。”仇兆鳌将“花叶随天意”句改作“花叶惟天

意”，对此注云：“诸本作随，犯重，当是惟字，盖声近而讹。”李植将下句的“随”字视为“须”字之讹，仇兆鳌将上句的“随”字视为“惟”字之讹，虽然两位学者的释义有所不同，但是疑问的着眼点，即“声相近意亦相似”之法，完全一致。又批《过客相寻》“呼儿问煮鱼。时间系舟楫，及此问吾庐”云：“问叠，疑间字，移筐果于客座间以煮鱼。”《草堂诗笺》、《千家注批点杜工部诗》及《杜诗谚解》皆将“呼儿问煮鱼”改作“呼儿间煮鱼”，而徐居仁编次《集千家注分类杜工部诗》和此本系统之《纂注分类杜诗》等作“呼儿问煮鱼”，或许李植未详察如《草堂诗笺》等注释书的原文，只是仅靠推测，竟暗中相合，可见他的学识之深厚，而且可足证明《杜诗批解》是以《纂注分类杜诗》为底本而批解的。又批《千秋节有感二首》其二“御气云楼敞”云：“御字，当作馭字看。”此亦利用“声相近意亦相似”之法，将“御”解释“馭”，意味通顺。又批《小寒食舟中作》“娟娟戏蝶过闲幔”云：“闲，一本作开字，为是过闲幔不成语。且杜子美不用闲字，又过闲闲过，皆无文理。惟舟中开幔见蝶飞过，乃实景真语。”李植对此利用理校之法，于文理上亦有可取者。如上所述，李植在校释中，采用了罗列许多证据的方法，可知他的眼光之广泛而精深。在整个杜诗中，“短褐”或者“𦑔褐”一词共出现七处^②。由于各种版本转写的不同，有的写作短褐，有的写作𦑔褐。历代对此也议论纷纷，难归于一。李植对杜诗的异文坚持“朱子以杜诗多误，分明此等处也”^③的态度，所以他也对“短褐”、“𦑔褐”的问题一共批解了三个地方，如批《冬日有怀李白》“𦑔褐风霜入”云：“𦑔当作短，此句则与还舟（还丹日月迟）为对，不可不称𦑔。”又批《桥陵诗三十韵因呈县内诸官》“诸生旧短褐（短一作𦑔），旅泛一浮萍”云：“若以浮萍为对，作短褐亦是。”又批《北征》“天吴及紫凤，颠倒在短褐”云：“短褐、𦑔褐之辨多矣。但有合用𦑔褐处，有合用短褐处。杜云‘𦑔褐风霜入，还丹日月迟’、山谷《被褐怀珠玉》诗‘棣藏心有待，褐短义难降’之类是也。今人才见短字，

便改以短，自以为秘考，可笑。”仇兆鳌于此也云：“若少陵‘短褐风霜入，还丹日月迟’与‘江湖漂短褐，霜雪满飞蓬’，以属对言，不当作短。”④李植和仇兆鳌的着眼点相同，所以他们的解析也相去不远，即以对句的方法解决了字句的模糊性。愚按对“短褐”的解释有两种说法，即不长的褐布衣的意思，或者在倒文的形式下解释为褐布衣短了的意思，但短褐的解释只有一种，即粗布衣服的意思。显而易见，李植和仇兆鳌的看法都非常精密，合于实际情况。又批《兵车行》“或从十五北防河，便至四十西营田”先引用师尹注云“防河，谓筑堤备河水泛决”。李植对此反驳云：“防河，防戎于河上，如言‘防河赴沧海，奉诏发精微’是也。注云：筑堤备防河决，则非也。备河决，乃中国之役民，非兵役也。防河，乃朔方西河等地也。”又批《秦州杂诗二十首》其六“防河赴沧海，奉诏发金微”云：“河海皆山东地，言防河赴海之军，皆起于金微。金微，西塞，其远可知。”由上所述，可见李植运用以杜证杜的方法，反驳旧注的谬误，得出比较明确的答案。钱谦益和仇兆鳌的见解也跟他大同小异，《杜诗详注》云：“钱笺：《旧唐书》：开元十五年十二月，制以吐蕃为边害，令陇右道及诸军团兵五万六千人，河西及诸军团兵四万人，又徵关中兵万人，集临洮，朔方兵万人集会州，防秋，至冬初无寇而罢。是时，吐蕃侵扰河右，故曰防河也。”⑤

二、论句法、章法

纵观中国的历代诗歌，常有一句一字而含蓄多意的现象，杜诗尤其如此。杜诗的许多诗句，都是运用极小量的文字，表达非常复杂，非常深厚的感情，即使是一二断句，也能反复吟诵，耐人寻味，故他自称“语不惊人死不休”。李植对此每每留意，他的批解也时有发明。如批《故武卫将军挽词三首》其三“部曲精仍锐，匈奴气不骄。无由睹雄略，大树日萧萧”云：“言将军死矣，而其部曲则犹仍前日精锐，匈奴尚未敢凌侮，此有制之兵，余威

之及也。但其雄略，则不可传而死，所以大树日觉凋疏云尔。四句一意，宛转妙甚，破的之论，有味之语。”李植如此解诗，说明平易，曲尽其义，而且注意到诗的结构问题。又批《醉歌行》“陆机二十作文赋，汝更小年能缀文。总角草书又神速，世上儿子徒纷纷。骅骝作驹已汗血，鸷鸟举翮连青云。词源倒流三峡水，笔阵独扫千人军。只今年才十六七，射策君门期第一。旧穿杨叶真自知，暂蹶霜蹄未为失。偶然擢秀非难取，会是排风有毛质。汝身已见唾成珠，汝伯何由发如漆。春光淡沲秦东亭，渚薄牙白水荇青。风吹客衣日杲杲，树搅离思花冥冥。酒尽沙头双玉瓶，众宾已醉我独醒。乃知贫贱别更苦，吞声踣躄涕泣零”云：“杜歌行多横竖说来。此作是直下铺叙，韩退之长篇亦是直叙，但有篇而无句，此作句句奇丽，所以后人不及。”此《醉歌行》的结构是三段，各段又是八句，上段称文笔之才能，中段叙述慰劳其不遇之事，下段述惜别之情感。此诗章法，平易明了直陈其事，而多数诗句即使从篇中抽出也具有独立的深意和美感，李植所谓“后人不及”处，即在其中。又批《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》“杜陵有布衣，老大意转拙”云：“意拙二字，是通篇眼目，愚字、濩落字、契阔字，皆从拙字来。又以一进一退为起伏，忧世者进取之意，江海者是退遁之志。”品评精深透彻，分析具体，领悟诗眼之妙。又批《秦州杂诗二十首》其三“年少临洮子，西来亦自夸”云：“‘亦自夸’三字，可见其俗，不但戎夷，年少亦以夷习相夸，且此是结句法。”批解明白通畅，句句节节皆合诗旨，令人易晓。杨伦亦对此句注云：“即闻阎听小子，谈笑觅封侯，意言习俗骄悍，居民亦然，尤见此邦可忧。”与李植之解释暗合。又批《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》“为人性僻耽佳句，语不惊人死不休。老去诗篇浑漫兴，春来花鸟莫深愁。新添水槛供垂钓，故着浮槎潜入舟。焉得思如陶谢手，令渠述作与同游”云：“此篇乃二意一串，主意则玩景；得意仍知述，故自言平日苦耽好句，今则遇兴即述，非复雕刻物状，以困花鸟也。只是新添水槛，故见水势如海，不得不

作，且愿得诗思如陶谢者，共赋此景也。意若谦损，实自豪夸。”吴见思对此首亦云：“江上值水势如海，题目奇伟，而诗中一字不写者。盖值此奇景，偶无奇句，故不能长吟，聊为短述耳。此题意在下三字，故通篇皆作自谦之词。”^⑥李植和吴见思，虽然处于异国他乡，但是著书时间相去不远〔李植（1584—1647），吴见思（1622—1685）〕，在明末清初的学术思想和动荡的社会背景下，对杜诗的评述，两人略有相同之处。又批《述古三首》其三“汉光得天下，祚永固有开。岂惟高祖圣，功自萧曹来”云：“四句一串说，而主意都在萧曹，隐然讽肃代无臣也。此句法乃‘岂有四蹄疾于鸟，不与八骏俱先鸣’，‘岂但祈岳与郑虔，笔迹远过杨契丹’之例便是从下倒说。”李植对此诗的章法结构，观察颇精微，分析合乎情理。由上所述，可以看出李植对杜诗体味甚深，分析也非常精确而公正。

三、系 年

杜诗号称“诗史”，其诗可以同唐史互为印证。李植熟于唐史，注解杜诗常常引史为证。如批《彭衙行》先引黄鹤注云：“当是天宝十五载；适白水后，七月闻肃宗即位灵武，公赴行在时作。”李植对此反驳云：“禄山反初，公先移妻子于奉先。其年十月往省而归，明年陷贼，又明年脱走行在，其年秋又恩许归省，此作乃述其初与妻子往鄜时事。《述怀》作于十月往省时，《北征》作于行在恩许时，其次序按诗自分明，而注者颠倒谬绕可厌。○此两年间其妻子又移避于鄜，甫往来其间，遂被捕。被捕时事未详也。此诗似指移鄜时事也。”历代对此诗的系年，议论纷纷，如徐居仁编次《集千家注分类杜工部诗》等取黄鹤说，认为天宝十五年作。仇兆鳌的《杜诗详注》则先引单复注“公避贼艰难之际，得孙宰顾遇，事后感荷而作”之语，以及黄希注“公避寇，在天宝十五载”之言，然后提出自己的看法，即“此云‘别来岁月周’，知诗是至德二载追忆避贼时事，非谓归鄜州如此也。”^⑦综上所述，可知

李植的指斥附合实际情况，非熟于唐史和杜诗者，不能如此。又批《郑驸马池台喜遇郑广文同饮》先引黄鹤注云：“诗云：‘燃脐郾邬败’，指禄山死，则是此是在至德二载作，盖禄山以是年正月为安庆绪所杀，公是时陷贼中，而郑驸马池台在河南新安县，不闻公陷贼时至东都。”李植对此反驳云：“此是收京后诗，如握节回，岂方被拘诗语？其起句乃乱后相逢多少悲喜之语，子美以冬末之东都，至春而归，正此时作无疑。”又云：“‘经死地’三字，尤是非被陷时作。”又云：“此歌舞岂陷贼时所为耶？以《哀江头》一篇考之，尤可明。”愚按，李植运用以杜解杜、以史证诗的方法，体察诗语文理的顺理与否，果敢地指摘前人之谬，阐发自己所见。此篇的分析也不例外，先以诗语和全体内容矫正黄鹤注的谬误，最后就诗的题目明确地提出自己的看法和主张。又批《述怀》先引王洙注云：“按《新唐书》：天子幸蜀，甫走避三川。肃宗立，自鄜州羸服奔行在，为贼所得。至德元年亡走，谒帝凤翔。”李植对此注云：“王弇州以《新唐书》为贗古书，此注果然，鄜州去凤翔远，禄山兵未尝至，其间有何贼兵，而乃微服奔行乎？杜在京陷贼中，以官微故不为贼调，得潜陷得脱，本末甚明，若先为贼得，则不死必污，岂复为子美耶？作史者泛看杜诗，不考前後掇取为传，故其失如此。”既以史证诗，又以诗证史。李植用被称为诗史的杜诗来考察史实的真伪，这种考证历史记录的新方法，有很大的价值和意义。

四、驳正旧注

如批《夏夜李尚书筵送宇文石首赴县联句》，先引用蔡梦弼注云：“李尚书，名之芳。宇文，明彧，尚书之甥也。石首县，属江陵。”李植对此反驳云：“宇文，疑即前篇所谓名晁者。彧，疑即前篇崔彧。看重泛字可见，但前题有错文。”此所谓前篇，就是《宇文晁尚书之甥崔彧司业之孙、尚书之子郑监审前湖》。愚按对此问题，前人没有提及，到李植才提疑问，而且得出比较正确的

答案，可见他丰富的识见。不久，在中国的仇兆鳌也引用王道俊《博议》的文句“题中宇文石首，即前宇文晁也。诗注或者，即崔或也。”^⑧而指出历代注释的谬误。到杨伦《杜诗镜铨》更具体地说：“仇注以尚书之甥十二字当是小注，近是，谓同游当有三人，孙字下有阙文却未然，或为世家子，故并叙其家世，观后《夏夜联句》诗，亦只此两人也。”^⑨仇兆鳌和杨伦的说明，可以证实李植的解释非常新颖，有值得借鉴的意义。又批《秦州杂诗二十首》其七“无风云出塞，不夜月临关”，先引用旧注，如杜田云：“《齐地记》曰：齐地有不夜城，盖古者有日夜中照于东境，故莱子立此城，以不夜为名。”将“无风”“不夜”为地名。李植对此论驳云：“无风而云常出塞，以山高故也。不夜之月，初月也，初月见于西方，此城在陇西极高处，胡月临其关门也。注皆失之。”李植的解释，是非常科学客观的分析，近于事实。杨伦亦对此提出相似的见解，即云：“山多，故无风而云常出塞；城迥，故不夜而月先临关，二句写出边境苍凉景象。旧注以无风、不夜为地名，无论穿凿可笑，而意亦索然矣。”^⑩愚认为至少杜甫作诗时当无此地名，不当以“无风”、“不夜”二者为地名，所以李氏和杨氏的说法是合理的。

五、《杜诗批解》的缺点

古人云“金无足赤，人无完人”，关键是“瑕能掩瑜”，还是“瑕不掩瑜”。《杜诗批解》也不免存在一些缺点，它的谬误在于过分穿凿，如李植批《入乔口》“树蜜早蜂乱，江泥轻燕斜”先引用旧注云：“田曰：水〔树〕蜜，棋也。崔豹《古今注》：棋，一名树蜜，一名木饴，而说者谓当作密，非也。若《望兜率寺》诗云：‘树密当山径，江深隔寺门’，自当作密。希曰：《本草》‘石蜜’，陶隐居云：即崖蜜也。又有木蜜呼为石蜜，悬树枝作之木蜜，即树蜜。自不必别求。况言‘轻燕而及江泥’言‘早蜂而及树蜜’，皆取其类。”李植对此云：“作密无疑，杜多误字，皆由注者曲说。”

又云：“水浅而生泥，与密不妨相对。”愚按唐代诗中最善于对仗者，可算杜诗。如此，可以推测此诗亦运用对仗手法。所以，若以“密”对“泥”，则不但艰涩于意，而且不附合于同类的词相对仗的规律。反而，原来的“蜜”对“泥”，才通顺于意，同时附合于对仗的规律，可叫做工对。如此分析，可见李氏否定的旧注较为妥当，李氏惑于“树密当山径”，过于穿凿，不免牵强附会。又批《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》云：“杜《写（感）怀》诗言‘采药山北谷’，又曰‘用心霜雪间，不必条蔓绿’此诗一时作。”愚按，李植此解必有错觉，《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》，题目上已有作诗的时间和处所，即乾元二年冬寓居同谷县时作，但是，《写怀》诗自云“巫峡”、“三岁”，永泰元年，杜甫赴云安。大历元年，移居夔州郭，三年下峡。此当是大历二年作，故三岁。诗又云“霜雪”、“岁暮”，所以可知此诗为大历二年冬作。李植只从类似的诗语中推测认为均是一时所作，可能是千虑一失之过。《杜诗批解》虽然存在一些瑕疵，但是它的真正价值仍然“瑕不掩瑜”。

综上所述，李植紧紧把握住儒家“温柔敦厚”和“诗言志”的传统观念，对杜诗作出多方面具有特色的批评与注解。他对杜诗的解说不夸张不空谈，力求从实际出发，“随寓目，评释证贬”（《杜诗批解》跋）。《杜诗批解》，显然融注了李氏自身丰富的文史知识和审美经验。这不仅直接有助于杜诗的研究，而且其批评理论，也值得借鉴。总之，李植的《杜诗批解》工作是非常成功的，既极大地保留了旧注中的精华，又不遗余力地反驳和纠正旧注中的谬误。可以说，李植的《杜诗批解》在朝鲜杜诗学史上做出了巨大的成就。他对杜诗的批评解释，有精辟独到之处，但也有由于时代和地域的局限造成的一些谬误。尽管《杜诗批解》一书是由朝鲜学者所作，但是其中对杜诗的深刻研究和细致探索，对中国杜诗学研究也有很大的学术意义。

注：

① 李植《泽堂集·谥状》辛亥条。

② 按年次序，1)《冬日有怀李白》“短（或作短）褐风霜入，还丹日月迟”。2)《奉寄河南韦尹丈人》“江湖漂短（或作短）褐，霜雪满飞蓬”。3)《桥陵诗三十韵因呈县内诸官》“诸生旧短（或作短）褐，旅泛一浮萍”。4)《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》“赐浴皆长纓，与宴非短（或作短）褐”。5)《北征》“天吴及紫凤，颠倒在短（或作短）褐”。6)《遣兴五首》其五“五怜孟浩然，短（或作短）褐即长夜”。7)《太子张舍人遗纈成纈段》“今我一贱老，短（或作短）褐更无营”。

③《杜诗批解》卷七《秦州杂诗二十首》其十三“神鱼人不见，福地语真传”句下李植注。

④ 仇兆鳌《杜诗详注》卷一。

⑤ 仇兆鳌《杜诗详注》卷二。

⑥《杜诗论文》卷二十《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》云：江上值水势如海，题目奇伟，而诗中一字不写者，盖值此奇景，偶无奇句，故不能长吟，聊为短述耳。此题意在下三字，故通篇皆作自谦之词。曰：为人性僻而惟耽佳句，耽佳句，故不惊人不止也。此少年事耳。至老来自嫌才尽，虽有诗篇，不过漫兴而已，即遇春来花鸟，亦不能搜奇斲句，以动深愁，即今日新添水槛，以供垂钓耳，乃水势腾没，直至槛边，反若浮槎，若入舟矣。如此奇景，安得心思与笔，如陶谢者，与之同游述作乎！

⑦ 仇兆鳌《杜诗详注》卷五。

⑧ 仇兆鳌《杜诗详注》卷二十一。

⑨ 杨伦《杜诗镜铨》卷十八。

⑩ 杨伦《杜诗镜铨》卷六。

作者工作单位：南京大学中国古典文学系

（本文责任编辑：李 然）